



▲ 清末民初山东等地农村老照片。

## 有限的社交

经济发展的水平影响着华北地区民众的社交关系和社会结构。

华北地区农业以旱作为主,且缺乏河道运输,因此,农村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远低于长江下游和四川盆地。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和较少的农业生产剩余,会造成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。因此,历史上华北的百姓在生产上与外界接触较少,社会关系相对简单、闭塞。

上世纪80年代,黄宗智曾深入距北京东北45公里、离顺义城仅2公里的沙井村,与70岁的李广志长谈数小时,从而对当地有了全新认识。李广志经常上集市,一有机会就去。1944年他与兄弟们

分田之前,余暇较多,上集次数也较多。问他上集干什么,李广志答曰主要为“看热闹”。上集比在农忙工作好玩,这比买卖东西重要,因李广志自己的农场主要种粮食谷物,实际上并没有很多的东西出售,也没有很多东西要买。上集时,他从不上茶馆聊天。李广志觉得上茶馆聊天是个奇特的念头,他在集市上也不和人交谈。当然他会看到一些面熟的人,但只“点头哈腰”为礼,而从不与人停下聊天。李广志觉得和村外的人聊天是件不可思议的事。

黄宗智本以为李广志至少会与相邻的石门村的人交谈。石门和

沙井只相隔一块菜园,而且自从1910年后两村共用一所学校。沙井约有三分之一的男童在该校读书。基于此,黄宗智推测沙井和石门两村之间应该有颇多社交往来。毕竟两村的居住点相距只约30米,而且孩子们同窗共读几年,肯定会在毕业后延续童年的友谊。但事实又一次出乎黄宗智的意料。李广志成年后几乎从来没有和石门村人交谈过。

黄宗智注意到,这种以村庄为界限的社交观,是当地村民的习俗惯例。邻里共同协助建屋的行动通常限于本村,不会延伸到相邻的村。办喜事时,首先邀请的是村中

的族人和村外的亲戚,然后是其他的同村人,一般不邀请别村的友人。村中通行的乡间辈分关系,也以一村为界限。

他分析后指出,村民与外界的接触程度,由村子的商业化水平而定。经济作物的种植意味着有较多交易活动,也意味着高度的社会分化。华北的商品化和社会分化程度,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然比较低。“满铁”调查的33个村庄之中,有25个没有占地超过百亩的在村地主。黄宗智认为,华北平原的大多数村庄分化程度较低、自成一体,所以村民的社交圈子往往局限于一隅。

为普适性现代化道路。

然而基于对调查资料的深入研究,黄宗智认定,直到20世纪上半叶,华北地区农村社会是相对稳定、闭塞、分散的,这种贫农经济结构阻碍了农业资本的积累和投资。尽管这一区域人口密度很高,但是由于农业生产方式的高度内卷,劳动力被紧紧拴在了土地上。与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运行逻辑不同,在当时的华北农村,商品化生产不过是解决农业收入不足和家庭劳动力有余的合理手段,而非追逐利润。因此,小农家庭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存在,反而限制了机器大工业的发展。

由此可见,黄宗智的研究既不是单一突出人口的重要地位,也并非简单地认为市场化推动了经济发展,同时结合了人口和市场化,得出的结论更加符合历史实际,所以在历史认识广度方面超出当时诸多研究,得以成为经典。

## 宗族不出村

南北方宗族观念的差异,也是中外学者一直津津乐道的话题,《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》有自己的理解。

黄宗智调研发现,当时华北的宗族组织不太发达,宗族唯一共有财产是几亩坟地。在这个宗族活动较少的地区,清明节是族人聚会的几个最主要的场合之一。此外,族人一般在春节时互相拜访。有的先到同族家拜年,然后再到邻居家拜年;有的则在长辈家中聚会,向叔伯们叩头;有的在一个族人家中聚餐,族人轮流主持这个集会,费用由大家分担。除了祭祖和过年,族人一般只在有喜事和丧事时聚会。在他调查的华北村落中,没有一个家族设有共同的谷仓、学校或祠堂,也没有援助其他贫困族人的惯例。对同族特别照顾的具体表现,仅限于坟田出租的优先权,所收的租金一般与通行的地租无异。

黄宗智调查发现,华北地区宗

族组织的空间范围,局限于一村的界限之内。宗族组织的薄弱,也就意味着村镇以及庶民、士绅界限之间联系的薄弱,村庄从而形成“内生的而又相当闭塞的政权结构”。在这种环境下,族内的纷争,例如分家时的争执,通常由族中威信高的人出面调解。这些人一般并非是族中辈分最高或年龄最长的人,而是族中最富裕和最能干的人。无法在族内解决的事项,例如不同宗族间的纷争,或村庄与外界的交涉,则由各族的领袖组成的“董事”协商处理。

黄宗智从客观条件角度对此给出了解读。他认为,华北平原多是旱作地区,即使有灌溉设备,也多限于一家一户的水井灌溉。相比之下,长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的渠道灌溉、围田工程,则需要较多人工和协作。这个差别,可以视为两种地区宗族组织的作用有所不同的生态基础。

▲ 大学问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黄宗智著  
《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》